

# 清华记忆

□ 刘小博（数学系）



一般大学名字都带有地区名或学科名，而清华这个名字则显得与众不同，超凡脱俗，隐约间带着点诗情画意，因此高考报自愿时斗胆填了清华。那时清华在数学方面只有应用数学系。我也不知道应用数学和别的数学有什么区别，别人告诉我那是用来计算卫星轨道的，是很有用而又很神秘的学问。于是我从遥远的大西北来到了清华应用数学系，那年我17岁。

清华的生活平静而有节奏。那时候没有多少外界的诱惑，倒也能安下心来读书。当时清华的教室比较紧张，每天除了上课之外，找一个教室自习也要颇费一番力气。夜晚在清华偌大的校园里跑这么一圈，上自习的兴致也消磨殆尽，于是有了很好的借口来放纵一下。图书馆的阅览室是最好的消磨时光的地方。虽然这里仍然坐满了人，但

是阅览室四面靠墙的地方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籍。这些书比专业课本自然有意思的多。即使站着看几个小时也不觉疲倦。

从图书馆到宿舍楼来回都要经过校河。刚到清华时，那条校河和北方田野里的河没有太大的区别。河岸长满了青草。两排粗壮的大柳树不知道在这里成长了多少个岁月。路过这里的时候，时而能想起诸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或“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句子。后来翻修校河，河边的大柳树砍掉了不少。我们班也曾停课一周参加了清理河床的劳动。新的校河比原来气派了很多，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每次看到它，总觉得不如以前的校河自然。

大学的功课毕竟比中学难度大多了。随着初入学的新鲜感渐渐的淡去，学习的压力慢慢地重起来。有

时还会隐隐的有些吃力。记得有一次上李永乐老师的几何与代数课，他偶然提到在由零和一组成的数域中一加一等于零。当时我们还没有学过抽象的域的概念，因此怎么也理解不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加法。看着别的同学好象都没有什么疑问的样子，觉得自己大概是笨得无可救药了，好在这个奇怪的数域在这门课里再没有出现过。

辅导员安连俊给我们

教数学分析习题课。他以前是清华77级的学生。我不知道他做过那本习题集里多少题。每次我问他里面的问题，他都能不加思索就告诉我怎样解答。安老师和我们住同一个宿舍楼，几乎天天能碰到，有问题时向他请教很方便。即使在楼道碰到他，他也会立即停下要做的事来回答数学问题。

安老师那时在准备研究生考试。他的宿舍不受灯火管制。经常能看到他很晚还在用功。考上研究生后他就从我们宿舍楼搬走了，从此宿舍楼的秩序就大不如前。晚上熄灯后还经常有学生在楼道活动。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流行武侠小说，很多同学对武侠小说着迷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我也是其中之一。有时候小说看到关键的地方宿舍里突然熄了灯，有些同学就到楼道去就着昏暗的灯光接着看。



当时给我们上课最多的是系主任萧树铁老师，从大学二年级开始，萧老师先后给我们教过常微、偏微和数学模型等课程。萧老师讲起课来挥洒自如、滔滔不绝，布置的作业并不多，但难度比较大。在我大学本科的所有考试中，只有萧老师的偏微和数学模型课是开卷考试。记得偏微考试出的一道题我们班没有一个人知道怎么做。萧老师曾提示过在某个俄语学术论文中可以找到答案。但是我们同学中没一个人懂得俄语。即使找到那篇文章也看不懂。最后大家只好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应付了事。交完卷子后全都提心吊胆。没想到最后居然蒙混过关了。回想起来，这大概是我们头一次接触带点科研性质的题目，虽然不是很成功，却也多少有些刺激。

大学三年级时，系里开始试点给本科生配备指导教师。我的指导教师是孙念增先生。孙先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说话慢条斯理，和蔼可亲。他没有给我们上过课。那时系里老师没有自己的办公室，学生宿舍也没有电话。每次我要找孙先生时都直接去他家，事先从来不打招呼。一按门铃，孙先生笑眯眯的开门让我进去，每次一谈就一两个小时。孙先生有很多藏书，大都是英文书，那时我还没有确定研究方向，他就随便借给我一些书让我看。那些书很深奥，读起来很吃力。我基本上没读懂多少。当我把书还给孙先生的时候，心里忐忑不安，生怕他考问我。好在孙先生从来没问过书里的内容，只问我读这些书有什么感觉。后来大概孙先生觉出我更喜欢纯数学，就鼓励我去北大选课或旁听。于是我先后选了兰以中老师的李群课和旁听了张恭庆老师的非线性分析课。由

于以前上过微分几何课，李群课还能勉强跟得上。而非线性分析课则要困难得多了，基本上听不太懂。回来和孙先生谈，他说第一遍听不懂没关系，以后再学就会容易些。于是我坚持听到了最后。

来听张老师课的有很多博士研究生和北大的老师。我每次听课时总喜欢坐一个固定的座位。一位北大的老师总坐在我前面的一个座位上。课间休息时他有时回过头来和我聊天。但我一直不知道他的名字。那学期结束后我在北大参加陈省身项目的考试，是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 Benney 教授和杜克大学的 Bryant 教授来进行口试。那是我第一次和外国人用英语交谈。考试一开始我心里就发了毛，因为他们两个人的话我很多听不懂。当时陪同这两个教授的正是我在张老师课上碰到的那位老师。他就好心地替我翻译。最后总算通过了考试。这也算听张老师课最大的收获吧。

大学的最后一年要办各种各样的手续。陈效中老师当时负责系里的行政工作。因此经常需要去系办公室找他。陈老师为人直爽，非常热心。很多同学和他接触后都挺喜欢和他打交道。不少同学在毕业以后还和他保持联系。我从清华毕业后曾去广州进行了七个月英语培训，然后又回到清华办理出国事宜。在此期间得到陈老师极大帮助。陈老师当时住在清华外面的一个中学里。他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住在校外的老师。有时在假期有事找他，就骑车直接去他家。陈老师总是给予热情接待。我在出国之后还经常和陈老师有书信来往。这种联系一直保持了大约十年之久。

八十年代的时候清华还是五年制。我和班上其他五位同学提前一年毕业。当我结束广州英语培训后

回到北京的时候，我们班大部分同学还在清华。其他五位已经毕业的同学也都在清华或北京其他院校上研究生。等到期末来临的时候，大家都意识到分手的时刻即将到来。系里给应届毕业生举行了送别晚餐。萧树铁老师和系里其他一些老师来为我们饯行。其间同学们轮流向老师们敬酒。也有同学当时喝醉了酒。那天晚上校园里特别热闹。当时电影《红高粱》公演不久。一群外系的学生在宿舍楼底下扯着嗓子唱电影里的插曲：“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往前走，不回头。通天的大路九千九百九。”歌声整整响了一夜。

来到美国后我还时常想起在清华生活的岁月。在清华的那段时间无疑是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之一。那段日子也是我读书最认真的时候，课本里的几乎每一句话都怕没完全明白。后来在美国读研究生时由于进度太快，读书时反而是囫囵吞枣，不求甚解。清华教过我们的老师都兢兢业业，诲人不倦，对学生关怀备至，堪称良师益友。在我来美国后，承毓涵老师和孙念增先生相继辞世。想起来顿感岁月无情。除了在广州培训的极短日子外，清华是我离开家乡后唯一在校园里住过的学校。感觉上清华就是第二个家。在那里我度过了四年多美好的时光。每当回想起那段日子，脑海中就会浮现出荒岛的荷塘月色，水木清华的山光云影。湖边站着朱自清先生白玉般的雕像，似乎在低声吟诵着：“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可是我们的时间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写于2007年清华数学系建系80周年之际）